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

——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谈 伟

(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 哲学与人类学学院,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哈勒市 D-06110)

摘要: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关键词:道德形而上学;自然形而上学;哥白尼革命;牛顿力学;心灵能力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3)05-0014-13

一、如何跨越从自然形而上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鸿沟?

在《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纯批》)第二版序言中,康德认为可以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里的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这场“革命”的任务由两个层次构成:一是在消极意义上对传统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批判,二是在积极意义上对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前者作为这门科学的入门或预习,是整个《纯批》正文所从事的工作^{[1]BXXII}①。至于后者,由于作为体系的形而上学对康德而言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自然形而上学,另一个是道德形而上学,因此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任务可以相应被拆解为回答两个问题:(1)如何通过哲学领域的革命使得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2)如何通过哲学领域的革命使得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只包含狭义的自然形而上学,所以如果康德完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这门科学的体系就顺理成章地来自未受批判的那个部分。对此,康德在《纯批》中曾根据不同原则,对形而上学的结构做过两种划分^[2]:在“先验方法论”中,自然形而上学包括先验哲学和纯粹

收稿日期:2023-02-27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2020]71号)

作者简介:谈伟(1991—),男,安徽合肥人,哈勒大学哲学系暨欧洲启蒙运动跨学科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康德原文均引自柏林科学院版康德全集,引用以“卷号:页码”方式标注,其中《纯粹理性批判》按照国际惯例用“A/B[版]+页码”标注,中文译文主要参考李秋零译本《康德著作全集》(1-9卷),同时参考了邓晓芒译本《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文中引用中译本仍用德文页码标注,局部翻译改动不作单独说明。

理性的自然学,后者又分为理性物理学、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四个部分;与之相对,“先验辩证论”则将纯粹理性的自然学划分为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三个部分,并论证了在三者中那些积极的超感性知识都是一些先验的幻象,^{[1]A845-A847/B873-B875}那么剩下的未被批判的部分就是理性物理学了,而这正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要建构的内容,因此这里从消极的批判到积极的体系建构是自然的过渡,它不会招致如何过渡的问题,这部分的研究也主要针对康德在《纯批》中是否成功地通过“革命”做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3-6]

但第二个问题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因为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分属两个完全异质的领域,前者关系到理论维度的“存在/是”,后者则关系到实践维度的“应当”,所以即便接受康德成功地做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无法像自然形而上学中那样直接导向对体系性的道德形而上学之建构,这里包含了从自然形而上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跨越。问题在于,既然康德认为通过哲学“哥白尼革命”也能使得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那么“革命”就不仅要负责批判,而且要承担解释这个“跨越”的任务,但若将“革命”仅仅在认识论上理解成从“知识遵照对象”颠倒为“对象遵照知识”,康德所能达到的最远距离仅止于形而上学的超感性对象不可知,而无法超出思辨哲学范围并与道德形而上学相关联。因此,如何通过“革命”实现此“跨越”,以便使得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人们一直将哲学“哥白尼革命”理解为知识与对象(甚或主体与客体)间关系颠倒,导致上述“跨越”问题长期未受关注。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指出“革命”不仅与康德的理论哲学相关,还关系到其道德哲学,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革命”内涵的理解,但它们还尚未在体系性的形而上学层面关照到上述“跨越”问题。^[7-10]邓安庆率先提出了这个被忽视的问题,并做了极富启发性的研究。他先后提供了两种方案:方案一,“革命”的实质并不是认识论上的关系颠倒,而是思维态度的转变,即从旧有的关涉到认识的思辨形而上学向关涉到行动的道德形而上学上的转变;^[11]方案二,这种思维态度的转变是从自然态度向反思性哲学态度的转变,哲学的态度指向认识能力本身,它内在包含了知识与对象间的颠倒,以此实现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向。^[12]但是,方案一由于直接将“革命”的实质归结为上述“跨越”,从而取消了“革命”作为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的这层基本含义;方案二是对方案一的推进,其解释力更强,但由于它将哲学态度视为对自然态度的校正,从而被限制在主体的先验能力之内,无法从理论哲学中摆脱出来,尚未进展到实践维度。不仅如此,以上研究均忽视了“哥白尼革命”所处的天文学史与哲学史语境,从而错失了把握哲学“哥白尼革命”实质的机会,导致在“跨越”问题上未能实现真正突破。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考察康德在回答柏林王家科学院的有关问题时对其哲学体系的阶段总结性文本;接着,通过追溯天文学史与哲学史的发生学语境,澄清天文学“哥白尼革命”并揭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最后,本文将依靠“革命”论证康德如何实现从自然形而上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跨越,从而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体系建构奠定基础。

二、“跨越”的一个例证:《形而上学之进展》

在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康德并没有从形而上学的体系性层面对上述“跨越”问题做过专门论述,唯一与此相关的文本是在康德去世之后由其学生编订出版的《形而上学之进展》(*Fortschritt der Metaphysik*) (以下简称《进展》)。^①该文本涉及到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主张,它作为例证佐证了康德确有解决“跨越”问题的思想意图,并且还对此作了局部的推进。

^① 从第二批判的起源来看,康德在直至《纯批》第二版完成前的数月,仍打算把对于“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纳入到《纯批》之中作为其附录,并希望借此总结“整个批判考察”,这说明康德当时仍意图从体系性角度解决“跨越”问题,只不过后来这一计划并未得到执行。克勒梅(H. Klemme)认为是由于康德此时发现了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和趣味判断的先天性,从而导致他放弃原计划并以《实践理性批判》取代之。参见 Cf. KLEMMER H F. The origin and aim of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REATH A, TIMMERMANN J.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30.

《进展》一文是康德针对柏林王家科学院的一个征文活动所作,征文题目是“自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时代以来形而上学在德国取得的确实进展是什么?”,可以看出,征文主题与康德在《纯批》两版序言中关于形而上学的声明高度相关,而且王家科学院发出征文的时间(1788年)也恰好在两版《纯批》出版后不久,这并非巧合,事实上,科学院征文正是针对《纯批》的,所以康德在《进展》中的回答也可以看成《纯批》序言中相关论点的进一步发挥。不过,《进展》并没有对“跨越”问题作出直接解答,这与康德完成这个文本时(1793年)尚未写作作为体系的《道德形而上学》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在于征文主题的限制,作为一篇“命题作文”,康德需要把他的论述限定在科学院指定的主题范围内,即相比于“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他自己的哲学进步表现在何处,这会导致康德在一些问题上不能深入展开,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体现形而上学之“跨越”的端倪。

征文的要求与康德自身关切的不同之处在于,康德对形而上学中的革命性转变关涉到历史上的所有形而上学理论,但征文则仅限定在“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中,这使得康德必须遵照该体系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来论述其进展,形而上学被该体系界定为“通过理性从感性的知识向超感性的知识进展的科学”^{[1]20:260},但康德认为这种定义将把形而上学限制在理论哲学范围,而同属形而上学的纯粹理性的实践学说则被排除在外,^{[1]20:261}对这个定义的不满在康德展开讨论形而上学进展时体现得更加明确,他说道:

“人们首先必须明白,根据前面科学院的任务,形而上学在这整篇文章中仅仅被视为理论的科学,或者如人们的还可以称呼的那样,被视为自然形而上学,因此它向超感性领域的过渡必须不能被理解为向一个可以被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的理性科学这个完全不同领域的行进,如果那样的话,这种行进将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地中误入迷途,尽管后者也把某种超感性的东西(亦即自由)作为对象,但不是根据那些依照其自然之所是的东西,而是根据那样一种建基于为了实践原则的行止之上的东西。”^{[1]20:293}

这段陈述表明,由于王家科学院要求将形而上学限定在理论哲学中,向道德实践领域的进展在此限定条件下会误入迷途,为了符合征文的要求,康德在文中搁置了对这个主题的讨论,但他同时指出了形而上学的进展还包含了向道德形而上学跨越的情形,可以预想,如果没有科学院任务的限定,解决从自然形而上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跨越问题也将构成康德考察形而上学之进展的一项任务。

但即便受到上述限制,在阐述形而上学所取得的进展时,康德也并未重复《纯批》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内容,而是提供了一个局部推进。具体来看,康德把形而上学的进展划分为三个阶段(Stadium):第一个阶段被称为理论——独断的进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内容是传统的存在论及康德的先验分析论,在这里他主要批判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中一些主要范畴的理解问题;第二个阶段被概括为怀疑性的中止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康德的先验辩证论,在此他主要批判了传统宇宙论中的问题;第三个阶段被命名为实践——独断(praktisch-dogmatischen)的进展阶段,在此他论证了理论理性的三个理念(灵魂、世界和上帝)如何在实践维度获得实在性,三个理念对应《实践理性批判》(以下简称《实批》)中纯粹实践理性的三个公设,不过康德认为由于它们在实践维度不是从纯粹的、而是一般的实践理性而来,所以它们仍归属于自然形而上学,而非道德形而上学领域。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内容并没有超出《纯批》的论述范围,所不同的是第三阶段,《纯批》在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超感性对象不可知之后,进一步指出这些理性理念具有范导性运用,尽管这些范导性的理念仍有其价值,但它们却不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康德在此处认为,三个理性理念在实践范围内能够重新获得实在性,而不仅是范导性运用。虽然由于受到科学院任务的限制,康德在形而上学进展方面所做的推进还未延展至上述“跨越”的论域,但它已构成其准备阶段,并预示了实现“跨越”的可能性。

三、基于历史语境的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重释

理论界普遍接受将康德在哲学领域的变革称为“哥白尼革命”,并且基本按照康德的下述经典表述来

理解它：

人们迄今认为,我们的所有知识都必须遵照对象;但是,关于它先天地通过概念来澄清某种东西,并依此来扩展我们知识的所有尝试,在这一前提下都化为泡影。因此人们可以尝试一下,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有更好的进展。^{[1]BXVI}

按照这个界定,哲学“哥白尼革命”的核心要义在于从原先的“知识遵照对象”倒转为“对象遵照知识”,也即知识与对象间关系的颠倒,但这里的“知识”不能是包含认知内容的、以判断形式表达的实在知识,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循环论证,亦即把作为“革命”之结果的“知识”用作了“革命”实施中的一个环节。由于知识总是关涉认知能力和对象两方面,所以此处的“知识”应该是认知能力的简称(康德也常把主体的认知能力本身称为知识),并且当康德在文中展开论述上述“尝试”时,他也确实是从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认知能力来阐述如何颠倒知识与对象间关系的。^{[1]BXVII-BXVIII}

但经典理解依然面临两个主要困难。第一、人们普遍认为,哥白尼是从“地心说”转变为“日心说”,而康德则相反,是从“知识遵照对象”转变为“对象遵照知识”,因此康德实现的非不应是“哥白尼革命”,而更应是反哥白尼的“托勒密革命”^[13]。第二、作为本文的焦点,按经典理解,“革命”只能在康德的理论哲学内适用,并不关涉到实践哲学,因而无法解释借由“革命”何以能使形而上学完成向道德领域的“跨越”。这些困难反映出经典理解是有问题的,事实上,经典理解蕴含了两个未加省思的前见:其一、哥白尼确实制造了天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其二、康德在哲学领域也制造了与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相应的革命。两个前见都是因忽视历史发生学语境所致,有必要在厘清因忽视哲学史和天文学史发生学语境而产生的错误交叠之后,通过把哥白尼学说置入更大的科学史语境中,指明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真实意涵,在此基础上揭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并指出它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具体表现,以此为解决形而上学的“跨越”问题做好准备。

(一)历史发生学语境中的“哥白尼革命”

虽然人们对“哥白尼革命”耳熟能详,但一些重要科学史家如库恩(T. S. Kuhn)^{[14]183}和科恩(I. B. Cohen)^[15]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哥白尼并没有在主观上意图实现天文学史上的革命。在库恩看来,哥白尼的首要目的是改进托勒密的经典天文学体系,因而无论在术语使用上还是在理论观点上,他都更应算作传统天文学的继承者。在通常被视为“哥白尼革命”实质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假说问题上,哥白尼提出这一假说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解释诸多天文学现象,而并非为了缔造新的天文学体系。相应地,康德也并没有将他在形而上学中的变革冠以“哥白尼革命”这一名称^[16],康德确实一方面提出希望仿照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形而上学领域实现思维方式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将它与哥白尼假说相关联,但当康德提到哥白尼时,他十分谨慎地使用了“哥白尼的最初想法”(die ersten Gedanken des Copernicus),而非“哥白尼革命”。

康德对自然科学革命的回顾,能够有力地证明他不会将哥白尼学说视为天文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根据《纯批》第二版序言中的说法,自然科学中的思维方式革命被认为是受到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的影响形成的,按时间顺序推算,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是在培根之后发生的,而《天球运行论》的出版时间(1543年)却远在培根的思想成熟之前。既然天文学属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那么康德不可能认为哥白尼学说是天文学中的一场革命,因此,通过与哥白尼天文学作类比来说明康德也实现了所谓哲学“哥白尼革命”的说法并不合理。

虽然哥白尼本人的学说还不能被称为革命性的,但如果我们将历史的发展线索拉长,其学说的价值和影响就逐步呈现出来,并最终导致了天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正如库恩所说,“《天球运行论》的意义不在于它自己说了什么,而在于它使得别人说了什么。这本书引发了它自己并未宣告的一场革命。它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文本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文本”^{[14]133}。根据库恩的主张,我们可以在更广的历史视域中重新审视哥白尼学说。依此主张,哥白尼学说经由布拉赫、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一代代天文学家的推动和发

展,最终在牛顿物理学中达到成熟形态,从这个角度看,天文学史上确实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

哥白尼开始提出假说时仍延续着托勒密天文学传统,保留了相当多托勒密体系的残余。开普勒将哥白尼假说彻底化,完全根据日心说主张发展哥白尼未竟的事业,并发现了行星运动定律,开普勒的工作证实了哥白尼的假说。然而,一旦这个原先有悖常理的假说被证实,就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科学疑难,传统宇宙观在地心说基础上有其自己的独立解释,可一旦地心说被否定,建立在其上的传统宇宙观将无法解释这些疑难,这促使科学家们必须要发展新理论来解释它们,牛顿力学体系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牛顿力学不仅解决了这些疑难,而且形成了新的宇宙观,取代了旧的宇宙观。由此,是日心取代地心的假说引发了引力理论的发现,并最终完成了天文学革命,与此同时,牛顿宇宙论体系在新的宇宙观之下赋予哥白尼假说以新的内涵,因此我们是在牛顿宇宙论体系中来看待日心说的,而当哥白尼提出假说时,他仍然在旧的亚里士多德宇宙观之下理解它。因此,并不是日心取代地心的假说本身代表了天文学革命,而是哥白尼假说诱导并引发了天文学革命,然后在天文学革命完成之后,哥白尼假说在新的宇宙观下被赋予了不同内涵。

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一直坚称康德发动了一场哲学“哥白尼革命”,这是由于这里出现了历史发生学的错误交叠。虽然哥白尼本人并没有发动天文学革命,但他的学说引发了这场革命,并最终塑造了一种新的宇宙观,当我们带着这种宇宙观再次回顾哥白尼学说的时候,自然地将整个知识结构带入其中,不自觉地认为这场天文学革命是哥白尼本人制造的。同样地,当我们把康德关于哥白尼假说的论述置于这个背景之下时,我们也在忽视历史发生学语境的情形下,把“哥白尼革命”的称呼直接赋予康德。不过,在澄清了导致错误的缘由之后,我们可以在接受康德未将哥白尼假说视为“哥白尼革命”的前提下,把由哥白尼引发、牛顿完成的天文学革命与康德在哲学领域的革命联系起来,从而有望使得哲学领域的革命重新获得哲学“哥白尼革命”的称呼。

(二)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重释

接下来,本文会在指明康德体系也相应地包含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基础上,依托康德对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相关陈述,将其与批判哲学体系中的内容相对照,揭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并说明它在理论哲学中的内涵,最后,本文将把“革命”的外延拓展到实践哲学中。

1. 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是心灵能力中的转变

当康德在《纯批》序言中引入“哥白尼的最初想法”时,这个导引性陈述本身还并不意味着哲学中的一场革命,而哲学“哥白尼革命”则要基于康德的批判体系本身才能得到整全理解。康德对此有明确意识,在序言的一个脚注中,他指出,“在这篇序言里,我把这个批判所陈述的、类似于那个假设的思维方式变革也仅仅当作假设提出来,这只是为了使人注意到这样一场变革的最初的、无论如何都是假设性的试验,尽管在这本书自身中这种变革是由我们时空表象的性状及知性的基本概念而得到并非假设、而是无可置疑的证明。”^{[1]BXVII}从这段话可知,革命或变革从序言中的试验到批判体系中无可置疑的证明,就如同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的假说在牛顿体系中获得确切的证明一样,由于康德将哥白尼假说类比到哲学中来,那么,根据天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这种一致性,也可以把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类比到哲学中,并将哲学“哥白尼革命”这一称谓赋予康德。

在前述引文的同一个脚注中,康德关于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阐述间接地预示了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康德声称:

天体运动的中心法则就这样获得了它们无可置疑的确定性,而它们一开始仅仅作为假说被哥白尼所假定,而且法则也同时证实了联结起世界构造的不可见的力(牛顿的引力),如果那第一个人不敢以一种违背感官但却是真实的方式不是从天空中的对象中,而是从它的观察者中去寻找被观察的运动的的话,引力就一直未能被发现。^{[1]BXVII}

这个脚注并不是对序言正文的简单补充,在序言中康德仅仅将“哥白尼的最初想法”作为假说提出

来,但这里他认为假说已经获得无可置疑的证明,并且康德还提到了牛顿的引力理论,鉴于牛顿体系恰好为哥白尼假说提供了确切的证明和解释,而且康德在这个脚注中有意将哲学与天文学中的情况对峙并举,考虑到《纯批》主体部分是对序言中假说的“无可置疑的证明”,把这段引文与《纯批》主体部分和序言相对照,将有望揭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

让我们先来分析引文中的两处重要细节。第一、引文开头的“天体运动”的原文是“die Bewegung der Himmelskörper”,与之相对,在序言正文中讨论“哥白尼的最初想法”时,康德使用的是“Himmelsbewegung”,后者直译为“天空运动”,二者的差别初看并不明显,但它们却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在哥白尼所处的时代,天文学家们普遍认为天空是由巨大的天球构成,宇宙中的星体镶嵌在天球之上,哥白尼也接受这种宇宙观,所以他的著作以《天球运行论》而非《天体运行论》命名,^[17]在这种宇宙观下的天球运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天空中星体的运动,而是镶嵌着星体的、作为天球的天空的运动。相反,现代天文学取消了天球的假定,由此在运动的是诸天体而非所谓的天球。当康德在序言中用“天空运动”时,他指的其实是“天球运动”,^[18]这表明康德是遵照哥白尼学说的本义看待“哥白尼的最初想法”的,而当他在脚注中使用“天体运动”时,他已经从哥白尼学说的宇宙观转回到现代宇宙观。不仅如此,因为行星运动法则是开普勒提出的,牛顿进一步完善了它,所以这里天体运动法则只能出自开普勒或牛顿,而非出自哥白尼。第二、在引文中“如果那第一个人不敢以违背感官……”里的“那第一个人”被默认为是哥白尼,现有的主要中英文译本也都将它直接替换为“哥白尼”^[19-21]。但这种看法十分可疑,因为康德在描述数学中的革命时用了同样的说法,其中,“那第一个演证出等边三角形的人”被康德视为是导致数学思维方式革命的人,按这种说法,天文学中的“第一个人”也很可能是指造成天文学思维方式革命的人,但根据康德的理解,这个人不会是哥白尼。并且,如前所述,哥白尼学说延续传统的托勒密天文学体系,所遵循的是数理天文学,而非现代物理天文学,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为了数理运算的需要,至于假说本身是不是违背感官,并不是他首要考虑的因素。所以认为“敢于违背感官”去颠倒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关系的人就是哥白尼并不恰当,更不用说“日心说”和“地动说”假说也并非哥白尼首创了。^{[14]141}

以上两点表明,康德对哥白尼学说与其后的天文学理论间的历史间距有明确意识,当他在该脚注中谈及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相关话题时,他已经从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切换到了现代天文学视域,并且已经以现代天文学为背景来反观哥白尼的原初假说了。由于第二版序言中模仿哥白尼的试验与批判哲学本身中的真正“革命”之间的思想间距就如同哥白尼与后哥白尼天文学之间的间距,所以可以将该脚注中对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看法“转译”到批判体系本身中,通过类比来揭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

按照上述引文的陈述,哥白尼假说在天体运动法则中获得证明,而天体运动法则又通过牛顿力学获得证明和解释,所以与前文对天文学史的概览一样,康德也将牛顿力学视为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成熟形态。根据《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是借助引力理论解释宇宙系统的构造及天体运动法则的,因此,根据康德的天文学观,可以把牛顿的引力看成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现在,要把这种关系类比到康德哲学中,就要在批判体系中找到与牛顿的引力相应的“不可见的力”(unsichtbare Kraft),像在牛顿力学中那样,这种“力”应当作为批判体系的基础。按照这个要求,它应当是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即认知能力,因为:首先,“力”(Kraft)和“能力”(Vermögen)在康德哲学中是紧密相关、常常被互换使用的概念;^①并且认知能力作为整个批判体系的架构基础也印证了这一点;而且正如牛顿引力理论为哥白尼假说提供了确切证明与解释,建基在心灵能力基础上的批判哲学体系也为哲学中的“哥白尼的最初想法”提供了确切证明与解释;不仅如此,这个类比与康德对“哥白尼的最初想法”的类比相一贯,康德将“知识与对象间颠倒”与哥白尼假说作比,而其中的“知识”,依前文所述,应该指认知能力,这里则是在此基础上把认知能力

^① 当然,“力”和“能力”之间在使用中有时会有区别,其中“能力”指导致行动可能性的内在原则,而“力”则关涉到行动的现实性,但这与我们此处的主张并不冲突。参见 Cf. WILLASCHEK M, STOLZENBERG J, MOHR G, et al. Kant-Lexikon[M].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15: 2481-2483.

提高到作为“革命”实质的地位。

进一步来看,由于自然科学中的“不可见的力”是自然界法则的原因,与之相应,认知能力在哲学中也应当成为作为经验对象之总和的自然法则的原因,康德关于知性能力之作用的论述恰好验证了这一点。与牛顿力学证明了一般的自然法则及天体运动法则相对应,在关系到自然的合规律性问题上,康德认为正是知性能力给经验对象的总和提供了先天法则,因为所有显象都是作为可能的经验,先天地蕴含在知性能力中,并且只有通过知性能力才成为可能,因此自然中的一切显象都必须首先与知性的先天形式吻合,这一现象被康德概括为“知性为自然立法”。所以,对康德而言,那导致联结起世界构造的“不可见的力”,在哲学中就是我们的知性能力,这与牛顿的引力是联结世界构造的“不可见的力”相一致,区别只在于康德是在形而上学的视角下考察自然的形式统一性,而牛顿则是在物理学中考察自然的经验原则。

因此,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就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这种转变遵照批判哲学体系,可以概括为认知能力从作为一种一般逻辑中的判断和推理等的能力转变为自身具有自发性与立法功能的“力”。特别地,在理论哲学中,认知能力是由一般逻辑中判断和推理等能力,转变为先验逻辑中的自发性和立法能力,认知能力的这种转变可以概括为从其一般逻辑运用向先验运用的转变。当然,这个类比在超感性领域中看起来似乎并不适配,因为毕竟牛顿的引力是自然中的机械力,它只被运用于感性领域,而康德的知性和理性能力表现为自发性能力,也能关涉超感性领域,且与自由法则相关。但这个类比是指两种“力”的发现过程以及它们在联结起世界构造的作用方面的一致性,而不是本性上的一致性,正如天文学哥白尼假说与其在哲学中的相应类比也并不完全同义一样。并且,康德也并不讳言自由法则与牛顿引力理论之间的类比关系,他在《遗著》(*Opus Postumum*)中曾声称道:“穿过空的空间的牛顿的引力与人的自由是相互类比的观念……”。^{[1]21,35}

回顾前述关于“革命”经典理解的第一个困难可见,认为康德实现的是反哥白尼的“托勒密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康德的哲学革命非但不可能是前哥白尼的“托勒密革命”,而更应被称为后哥白尼的“哥白尼-牛顿革命”^{[10]498,514}。接下来,本文把目光转向本节开头的第二个困难,把发现头顶星空法则的天文学“革命”同样“转译”到实践哲学中,以澄清能够发现我们心中道德法则的“革命”之内涵。

2. 道德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

综观《纯批》第二版序言,康德的讨论基本限定在思辨哲学范围内,但在论述了与哥白尼假说相类比的试验在思辨哲学中的作用之后,他对该试验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也做了简短说明,这也是序言中唯一正面论述此问题的地方,该部分对于拓展“革命”的外延格外重要。康德说道:

“现在,当否认了思辨理性在这个超感性领域中的一切进展之后,仍然留给我们来做的是作一次试验,看看是否能在它的实践知识中发现一些依据,来规定无条件者这个超越的理性概念,并以某种合乎形而上学的愿望的方式、借助于我们只不过在实践的意图上才可能的先天知识来超出一切可能经验知识的界限。”^{[1]BXXI}

康德认为,在理论哲学中进行了第一次试验之后,还可以再“作一次试验”,这次的试验是在实践领域中进行的,由于康德试验的目的是为了引出真正的“革命”,表明康德的形而上学革新计划不仅与自然形而上学相关,而且关涉到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因此,“革命”向实践领域的拓展并非我们的主观类推,而是已经内在包含于康德的思想中了。

关于“革命”外延的拓展,尽管康德并没有明确指出,但可以根据理论维度的“革命”将其推导出来,由于在实践维度仍是从“试验”开始的,所以正如在理论维度借由颠倒知识与对象的尝试引出“革命”一样,我们也可以在实践维度从考察知识与对象间关系入手。要弄清楚在实践哲学中如何有知识与对象的颠倒,关键在于对引文中提到的“实践知识”的理解。与我们的通常观感不同,除了狭义的理论知识,康德也在广义上理解知识。广义的知识理论同时包含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关涉一个东西“是什么”不同,实践知识关注“应当如何”,亦即行为主体的行动可能性,它表达为命令式,而命令式分为定言的和假言的,所

以实践知识包含定言命令式和假言命令式,^{[1]4:414}且其中定言命令式就是实践哲学中的先天综合判断。这样,如同“知识与对象的颠倒”里的“知识”在理论哲学中是指理论认知能力,它在实践哲学中应当是关系到欲求的实践认知能力,相应的“对象”则是欲求对象,由此在实践哲学中也可以有相应的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颠倒。

当然,颠倒知识与对象间的关系作为试验只是提供了探索“革命”实质的前提,其本身并非是“革命”的实质。如前所述,“革命”的真正实质是与牛顿引力相对的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中的转变,我们可以把这个一般性说明限定到实践维度,按此类比,实践哲学中的“不可见的力”应当是实践的认知能力,因此实践维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就在于实践的认知能力本身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于心灵能力从原先的仅具有一般实践的运用转变为也包含纯粹实践的运用。与理论哲学中情况相似,可以通过康德对理性能力之纯粹实践运用的论述来验证这个类比。康德认为,纯粹实践理性单凭自身就能够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并由此成为源初立法,所立之法即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或道德法则,实践理性的这种作用通常被概述为“理性为自身立法”,而且道德法则还指示了一个“理知世界”,并积极地规定着这个世界,而这个超感性的理知世界在理论哲学中曾经只具有消极含义。因此,正如牛顿引力是联结起感性世界的“不可见的力”那样,理性能力在其纯粹实践运用中就是联结起超感性世界构造的“不可见的力”。

四、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一项“哥白尼式”进程

论证了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是心灵能力自身中的转变,并将其外延从思辨维度拓展到了实践维度之后,现在回到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向实践领域的跨越?通过解答如下三个问题来回答:(1)形而上学在一般意义上是否可能?(2)如何从自然形而上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3)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奠基?本文将表明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要依赖哲学“哥白尼革命”,亦即依赖心灵能力的转变,这些心灵能力将依次表现为知性的先验运用和知性的实践运用、理性的先验运用和理性的实践运用,根据它们在关涉和未关涉到对象时的不同表现,形而上学的这一“跨越”将展现为一个层层递进的实践转化过程。

(一)知性的先验运用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既然康德认为历史上所有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尝试都失败了,那么首要的问题便在于:形而上学是否还能够某个地方是可能的?现在,由于“形而上学真正说来只与先天综合命题打交道”^{[1]4:274},所以问题转化为: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如果一般的先天综合知识是可能的,那么作为其特殊门类的形而上学知识就是可能的。康德是通过哲学“哥白尼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革命”的呈现方式却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具体说来,由于判断是知性的机能,所以这一“革命”自然首先发生在知性能力之中,康德在《纯批》B版范畴演绎中对此作了详尽分析。关于这个演绎,亨利希指出,它的证明结构由两个步骤构成,其在康德文本中以“演绎”第20、21节为界^[22],恰好构成证明形而上学可能性的线索。在第一步中,康德通过演绎,呈现了知性能力中“哥白尼革命”的实质:一切所予直观中的杂多都必然从属于知性范畴,直观中杂多之成为“一个”(Eine)的根据不是在其自身中、而是存在于知性的统觉的先验统一性之中,^{[1]B143-144}换句话说,“革命”的实质是,知性能力从仅仅作为表现概念间关系的表象的判断功能,转向使得所予直观获得统觉的客观统一性的统一性功能,亦即从一般逻辑应用转向先验应用,在这里康德抽象掉了所予直观被给予的方式。在第二步中,“革命”使得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通过将所予直观被给予的方式补充进来,进一步指明一个所予直观的杂多中被规定的统一性正是经验性直观中的统一性,所达到的结果是,经验对象遵照我们的知性能力,而非知性能力遵照经验对象,这是人们关于“革命”经典理解的深化版本。它只是“革命”的表现而非实质。由此,先天综合判断(就其针对经验对象而言)如何可能的问题,借助演绎的这两个步骤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但是,由于知性在此处的自发性不是纯粹的,使得范畴只能限制运用在经验对象上,而由于康德在范畴的先验演绎中表明,范畴的超感性使用都是无

效的,可是形而上学知识的最根本特征恰恰是超感性的,因此,尽管康德通过“革命”证明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但却由于知性应用的限制性,同时证明了所有积极意义上的思辨应用的自然形而上学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革命”否定了所有积极意义的自然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它同时却也为某种可能的形而上学留下了余地。重新审视上述范畴演绎的第一步,其中,范畴赋予其统一性的所予直观的被给予方式抽象掉了,但在直观的方式未能被给予的情况下,知性同样必须关涉对象(因为思维不过是把所予直观与一个对象联系起来的行动),区别在于,此时该对象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1]A247/B304①},所以根据知性能力的运用,可以划分出两类对象:经验对象和先验对象,而先验对象(或知性对象)“根本不能包含任何被规定的直观,因而所涉及的无非是就知识的杂多性在与一个对象的关系中而言、在该杂多中必然遇到的那种统一性”^{[1]A109}。因为知性范畴只能规定经验的对象,而不规定先验对象,此时这个先验对象就仅仅是一个未被规定的思想,它可以在否定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不是感性直观的客体,康德称之为否定的本体,以与被知性范畴所规定的、通过理智直观所认识的肯定的本体相对,后者作为非感性直观的客体是超越的对象。在此,“革命”再一次导致了知识与对象间的关系颠倒,即从知性能力遵照一般对象转变为先验对象遵照知性能力,而且由于先验对象无非是在直观杂多中必然遇到的知性范畴的统一性,因而这里的“遵照”还不是指某个对象被认知能力所规定,而是对象的存在由认知能力所设定。既然存在着未被规定、且不能被知性范畴规定的对象,那么至少与此对象相关的先天知识就是可能的,只要这个对象能够在别处得到规定,并且它作为超感性对象,与形而上学不借由任何经验、直接以认知能力为根据的要求相一致,那么,形而上学在某个地方就是可能的,而且是逻辑地、而非实在地可能的。并且,考虑到先验的知性对象形成的世界即是知性世界,且知性对象除了是“一般感性直观的对象,因而对于一切显象来说都是同一个东西之外,对于它我们没有任何概念”^{[1]A253},因此不存在(作为复数形式的)诸多种类的知性对象,且“世界”不过是诸对象的总体,这样,先验对象与知性世界之间就不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二者的所指是相同的。因此,与知性对象一样,这个(先验的)知性世界同样是未被规定的、但却是可思维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在这个知性世界的领地上,某种形而上学就是可能的,这也正是《纯批》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思辨哲学能够为形而上学留出地盘所要表达的意思。

(二)知性的实践运用、理性的先验运用与向道德形而上学的过渡

既然形而上学是可能的,而前面已证明它不可能是自然形而上学,按照康德对形而上学体系的划分,它就只能是道德形而上学了,因此就存在着从自然形而上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过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一过渡是如何可能的?本文将表明,上述知性能力中的“革命”同样是回答过渡可能性的钥匙。为此,需要预设道德形而上学是实在地可能的,由此道德法则能够直接地规定意志(这个假定将在下一小节证明),考虑到先验对象和知性世界间的对等性,有两种等价方式来证明过渡:(1)证明纯粹实践理性能够规定在理论哲学中未被规定且无法被规定的先验对象;(2)证明在理论哲学中未被规定的、仅仅可思维的知性世界在实践领域中得到了规定,进而使得理论哲学中所悬置的领地能被实践哲学中的知性世界所填充。前一证明方式难以达到,因为在实践应用中理性关涉意志的规定根据,所以它并未直接与任何特定对象相关联。在后一证明方式中,这个知性世界无非是感性世界抽掉所予直观的被给予方式之后留下的纯然知性形式,即知性范畴的统觉统一性本身。据此,当道德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被预设,这个知性世界在实践领域就得到了规定,因为道德法则能够“指示一个纯粹的知性世界,甚至肯定地规定着这个世界”^{[1]5:43},所以上述问题就转化为:道德法则为何能够规定知性世界?它等同于:知性范畴为何具有实践的且超感性的运用?知性能力之具有实践的运用,是因为知性除了具有在理论知识中与对象所处的那种

① “先验对象”是在一个充满歧义性的概念,在《纯批》B版中它被否定的本体等表述所替代,我们在此不去纠缠此概念所带来的理解困难,而只需要明白它是由知性的先验运用所产生的,并且是与知性对象、否定的本体在对等意义上被康德所使用的即可。

关系之外,还有一种与欲求能力的关系,并且由于欲求能力就是意志,因此纯粹知性在此就是纯粹意志^{[1]5:55}。这样,纯粹意志的概念中就包含了所有的知性范畴,这意味着知性范畴同样可以有实践的运用。现在问题是:知性范畴的实践运用为何可以是超感性的?这恰好同样是由知性能力中的“革命”达到的。上一小节中曾指出,B版演绎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悬置了直观被给予的方式,第二步将直观的被给予方式添加进来,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这种区分的重要性。第一步中,由于范畴的起源独立于一切感性条件,这意味着范畴并不必然要限制于感性对象;与B版演绎第二步不同的是,只要它不是在其理论运用中被限制在现象上,那么它在一个纯粹知性的对象上就同样有其运用,所以“革命”所产生的知性范畴的统一性就能在实践领域中得到运用,而在理论哲学中,范畴的超感性运用却只能导致幻象。^{[1]5:55-56}这样,条件(2)被证明,所以通过哲学“哥白尼革命”就证明了向道德形而上学的过渡是可能的。并且,“革命”再一次颠倒了知识与对象间的关系,即通过“革命”使得知性对象(知性世界)遵照知识(纯粹实践理性),而在“革命”之前,经验上有条件的理性,独裁地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并使得知识(一般实践理性)都遵照对象(质料性客体)。这比上一小节中的“关系颠倒”前进了一步,即这个仅仅被设定的先验对象现在还得到了认知能力的规定。

除了过渡的可能性,还要证明其为何具有必然性。由于理性能力不直接关涉经验对象就可以独自起作用,它表现为总是要从感性上的有条件者向无条件者无限上溯的能力,这种理性的统一性能力构成了过渡发生的推动力量:首先,思辨理性为感性上的有条件者寻找无条件者,尽管产生的不过是先验幻象,但它使形而上学不会走上怀疑论的迷途,因为理性即便一无所获,也永不放弃追寻某种形而上学的努力,因此,思辨理性甚至督促人们,用理性的实践依据去充实思辨理性所留下的位置^{[1]BXXII};更重要的是,实践理性的统一性要求,为理性存在者本身的行为寻找绝对无条件的行为法则,尽管实践理性也无法达到无条件者,但实践理性的上溯不是导向幻象,而是在法则要求事情应当如何发生的引导下,不断促动主体遵照纯粹实践知识去行动^{[1]4:463};不仅如此,由于实践理性的优先性,使得实践理性在理论理性所止步的地方继续行进。这样,理性的统一性能力使得过渡的发生具有了必然性。与知性的统一性一样,理性之统一性能力的发现同样来自哲学“哥白尼革命”。理性的一般运用是一种间接推理能力,在此意义上,它与知性作为判断能力是一样的,但是,理性在其一般逻辑应用中表明“它本身包含有既非借自感性、又非借自知性的某些概念和原理的起源”^{[1]A299/B355},在此起源之上呈现的是不同于其一般逻辑应用的先验应用,即一种自己产生概念或原则的能力。与知性中的情况一样,理性从被动地接受概念并依靠概念从事推理的一般逻辑应用,向自己产生概念及其对象的先验应用的这种转变,正是理性能力中的“哥白尼革命”。

(三)理性的实践运用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即为其奠定基础,所以严格说来前述两个步骤也属于奠基,但此处本文将论题限制在实践哲学范围内,将奠基问题转化为如下两个问题:其一、道德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其二、道德形而上学何以能成为现实的?本文将表明,两个问题都能依靠在外延上拓展了的哲学“哥白尼革命”得到解答。需预先说明的是,对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们首先会想到康德的同名著作,但因《实批》更能凸显“革命”在奠基中的作用^①,应把研究重心放在第二批判中。

如同证明思辨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等价于证明纯粹理论理性知识是否可能一样,证明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即证明纯粹实践理性知识如何可能,它包含两个步骤:一是提供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二是提供道德法则能够直接规定意志的根据。第一步中,因为自由“当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1]5:4},所以问题在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对此,本部分第一小节通过知性能力中的“革命”,划分出了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而知性世界保全了自由理念的可设想性,由此“革命”使得先验的自由成为可能。第二步中,康德认

^① 因为《实批》的文本架构也根据主体的认知能力,能与“革命”的实质相关联,而且它是在《纯批》第二版序言(康德论及“革命”的地方)之后完成的,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则是在其之前写完的。

为,通过“给一个曾经仅仅被否定地设想的、思辨理性批判无法理解但却不得不假定其可能性的因果性添加了肯定的规定,亦即一个直接地规定意志的理性的概念”^{[1]5:48},可以证明法则的客观实在性,这里“思辨理性不得不假定”的是先验的自由,而所添加的“肯定的规定”则是意志的自身立法,而自由的可能性已被证明,所以问题转化为:意志的自身立法或自律如何可能?康德认为它是理性的事实,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作为它的根据。尽管不能追问进一步的根据,但它的现实性毋庸置疑,所以其可能性自然也无须质疑,这就揭示了实践理性的先天立法,在此体现出发生在实践理性中的“革命”,理性在实践领域中从其仅仅被动地从经验性质料中取得意志的规定根据转变为其也能单凭自身就能够规定意志,亦即从其仅仅具有一般的实践运用转变为其也有纯粹的实践运用。并且,理性的纯粹实践运用要以自由的可能性为基础,所以发生在实践理性中的“革命”还以理论理性中的“革命”为基础。因此,哲学“哥白尼革命”就使得道德法则及其客观实在性成为可能,进而使得道德形而上学成为可能。

道德形而上学要成为现实的,就必须关涉经验对象,但与理论知识中是对象在感性直观中直接给予不同,前者作为纯粹实践知识的体系,要求不借助任何经验就“使得这个对象成为现实的”^{[1]BX},是通过法则对意志的规定,促使主体产生让对象得以现实化的行动。那么,纯粹实践知识能够使得对象成为现实的根据在哪里呢?康德认为,这个根据同样只能来自于理性能力本身,因为理性在纯粹实践运用中不仅具有先天的立法能力,而且其立法对我们还带有采取行动的强制性,并使得法则在人这里成为一个命令式。康德认为法则的强制是无可否认的,因为人们只需考察对自身行动合法性的判断就会发现,“无论偏好在这中间会说什么,他们的理性却仍然坚定不移地和自我强制地把采取一个行动时意志的准则保持在纯粹意志上”^{[1]5:32},因此,纯粹实践理性以源初立法的方式要求主体依此行动:“我如何想,便如何吩咐”^{[1]5:31}。但康德在这里只是描述了这个现象,至于理性为何具有促使行动的强制力以及这种强制如何通过我们的认知能力起作用,康德都没有给出详尽解释,对理性具有强制力的根据及其具体如何发生作用的深入探讨需要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找到更进一步的回答。^[23]正如天体运动法则证实了联结起世界构造的“不可见的力”一样,道德法则证实了理性之中联结起世界应当如何存在的“不可见的力”,由此,事情应当如何发生的根据,不是在世上的对象中,而是在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中。理性中的这种力使得知识与对象之间发生了第四次关系颠倒:从此前所有他律道德中意志(作为认知能力)被经验性的对象所规定,颠倒为在自律道德中由道德法则(作为理性立法能力)对意志的规定,并通过这个规定在行动中产生现实的对象。通过新的关系颠倒,道德形而上学取得了现实性。^①

至此,文章通过哲学“哥白尼革命”在每一个步骤中的作用,使得形而上学展现为层层递进的实践转化过程(如图1),完成了从自然形而上学向道德形而上学跨越的任务。

五、结语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由邓安庆最先提出的,完成论证之后,重新审视他的思想主张,得到下述结论。从邓安庆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看,本文接受并辩护他的洞见,即康德伦理学能够与形而上学结合,使得伦理学获得第一哲学的地位。而他给出的两个解决方案包含了不同的理论指向,方案一把“革命”自身理解为从自然形而上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转变,导致两种形而上学的对立;方案二则把“革命”视为达到形而上学转变的手段,且这种转变可以用一个如图1所示的转化过程来刻画,预示了形而上学在思辨领域与实践领域之间的内在统一(尽管他并未明确提出这个主张)。由于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地位,两种理

^①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段通过道德法则作为理性的事实,证明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本段指明它具有产生行动的能力,并用它论证道德形而上学的现实性,这表明理性的事实兼具事实与行动的双重意义,邓晓芒曾指出过这一点,并从“事实”(Faktum)概念的词源学角度说明这一现象,但他没有进一步讨论导致它有双重意义的根源。而实践理性能力中的“哥白尼革命”则能够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向,即从我们的理性能力本身出发来解释它。参见邓晓芒:《从康德的 Faktum 到海德格尔的 Faktizität》,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7-25页。

论指向不仅关涉到两种形而上学之间的关联性,也一般地牵涉到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行动的关联性,鉴于“是/存在”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在哲学中的重要性,这种差别不容小觑。本文试图推进第二种理论指向,把形而上学的“跨越”展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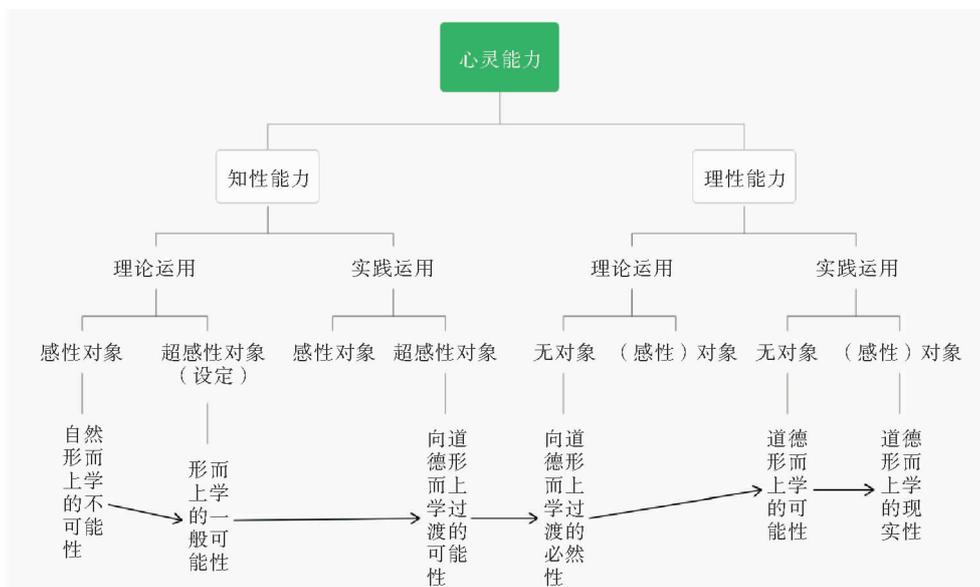


图 1 形而上学实践转化的“哥白尼式”进程

从康德本人的思想发展来看,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是贯穿康德整个哲学生涯的中心使命,从他于 18 世纪 60 年代向赫尔德承诺一部《道德形而上学》开始,到 18 世纪 90 年代正式完成这部著作为止,期间的那些关键性著作都可以看成为了达成这项任务的副产品。因此,应当从体系性角度出发,综观考察康德思想诸部门之间的关联性,而不应只是肢解性地在认识论、伦理学或科学哲学等哲学分支内部看待其思想,这是本研究的思想关切所在。从形而上学论题本身来看,形而上学在当代遭受严厉的批判与拒斥,这种反形而上学思潮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自然科学通过实证方法揭示自然规律,与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特质相对立,而康德恰恰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揭示出形而上学的实践本性,促动了形而上学自身的实践转化,这为我们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当代命运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其思想价值有待进一步开掘。最后,在解决核心问题过程中,本文提出了对哲学“哥白尼革命”的不同于以往的新解读,但由于“革命”的内涵与表现等不构成本文的中心任务,所以需留待后续深入。

参考文献:

- [1] KANT I.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00.
- [2] 宋博. 康德论形而上学的结构: 一项基于历史语境的初步考察[J].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2019(2): 33-49.
- [3] 崔平. 康德为科学形而上学奠基的卑微效用[J]. 江汉论坛, 2010(1): 11-17.
- [4] 张志伟.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内在形而上学”[J]. 哲学动态, 2011(5): 29-36.
- [5] 舒远招, 彭志君. 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科学的自然形而上学的建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2): 16-24.
- [6] 邓晓芒. 论康德对自然形而上学的重建[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6): 72-77.
- [7] BLUMENBERG H. Die Genesi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M]. Frankfurt: Suhrkamp, 1985: 691-713.
- [8] 迪特·亨利希. 自身关系——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的思考与阐释[M]. 郑辟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1-12.
- [9] BRANT R.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bei Kant[M].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7: 223-258.

- [10] SCHÖNECKER D, SCHULTING D, STROBACH N. Kants kopernikanisch-newtonische analogie[J].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2011(4): 497-518.
- [11] 邓安庆. 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 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4): 86-93.
- [12] 邓安庆. 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德国古典哲学的道德事业之重审[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81-100.
- [13] 康普·斯密.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M]. 韦卓民, 译. 高新民, 整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64-65.
- [14] 托马斯·库恩. 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M]. 吴国盛, 张东林, 李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5] 伯纳德·科恩. 科学中的革命[M]. 鲁旭东, 赵培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367-374.
- [16] HANSON N R. Copernicus' role in Kant's revolution[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59(2): 274-281.
- [17] 哥白尼. 天球运行论[M]. 张卜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7.
- [18] 冯玉骁. 康德“哥白尼的最初的观点”译文考释与辩证[J]. 世界哲学, 2022(3): 68-74.
- [19] KANT I.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 GUYER P, WOOD A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3.
- [20]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8.
- [21]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康德著作全集: 第3卷. 李秋零, 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4.
- [22] HENRICH D. The proof-structure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J].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69(4): 640-659.
- [23]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M]//费希特文集: 第1卷. 梁志学, 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676.

On Kant's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Metaphysics: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Copernican Revolution”

TAN Wei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 Halle(Saale), Sachsen-Anhalt, D-06110, Germany)

Abstract: I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ncern within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o facilitate metaphysics from the speculative to the practical domain. In the preface of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Kant expounded that we can securely guide metaphysics along the path of science through a revolution in the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Since Kant divided metaphysics into two parts, namely,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 and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volution” should not merely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we can employ this “Revolution” to transform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 into a science, but also how we can employ it to make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to a science. However, the critique of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of nature does not directly lead to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It contains a gap between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 and of morals that needs to be bridged. So the “Revolution” must take on this task. Yet, based on the classical explanation that interprets the “Revolution” as a shift between knowledge and object, we cannot transition from the speculative dimension to the practical one. This classical explanation disregards the historical and genetic context of both astronomy and philosophy. The astronomical “Copernican Revolution” was not solely initiated by Copernicus; rather, it began with Copernicus and culminated in Newtonian Mechanics. To contextualize the astronomical “Copernican Revolution” within Kant's philosophy, we will unveil the esse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Copernican Revolution”. This essence does not involve a reversal of knowledge and object but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gnitive abilities of the faculty of the mind itself. As a result, the “Revolution” can be further extended to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in accordance with Kant's epistemology. By showcasing how the faculty of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is differently employed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we will illustrate how Kant bridged the gap through the philosophical “Copernican Revolution”. This process emerges as a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ultimately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Key words: metaphysics of morals; metaphysics of nature; Copernican Revolution; Newtonian mechanics; faculty of mind

(责任编辑: 傅游)